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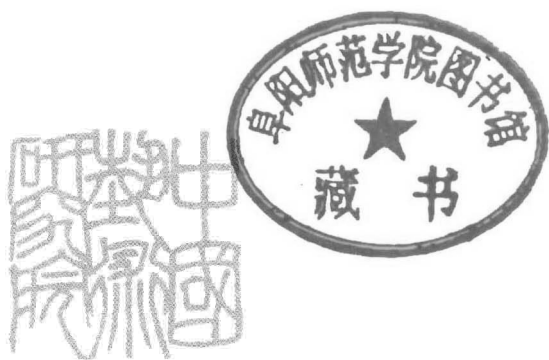
红海求索集

孙玉明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红海求索集

孙玉明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海求索集 / 孙玉明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80769-205-8

I. ①红… II. ①孙…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703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红海求索集

著 者 | 孙玉明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周海燕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300千字

版 次 |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205-8

定 价 |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芃芃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朱智润 韩 进

委 员	王训海	左克诚	余 玲	杨红卫
	杨迎会	李 强	张国平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自序

自从1986年秋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便自以为是地开始撰写所谓的学术文章，1989年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文章才真正开始公开发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读研期间撰写的一些文章。那时的我，自信满满，踌躇满志，也算是一个无知而又无畏之人。每当投稿被退回，便理所当然地要抱怨自己之所以怀才不遇，就是因为那些编辑们有眼无珠。到了1996年，文章已陆续发表20余篇。有一次，正得意洋洋地阅读着某刊物上刊载的自己的文章——这是读研期间撰写后又重新修改且自鸣得意的一篇文章，突然间顿觉十分汗颜！直到此时，方才明白自己当年撰写的文章居然如此稚嫩！近年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随着人生阅历和阅读量的不断增加，胆子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因而即使要写一篇短小的文章，也总是不敢轻易动笔。愚以为，就常理而言，这种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作为茫茫宇宙中小小星球上的一种生灵——人，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又能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呢？！

时至今日，除几部所谓学术专著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外，我一共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这其中不仅涉及《聊斋志异》、《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古典小说，而且还涉及武侠小说等。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这些不成熟的文章，直接反映了笔者在学术之路上的艰辛探求，虽为敝帚，亦足自珍。众所周知，红学既是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

国学术界的一个典型，其内涵之广博，亦如学海之茫无际涯，欲求其真，其难可知。在此，且借用屈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将拙作名之曰《红海求索集》。

拙著分上、中、下三编，共收录16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上编”收文6篇，《〈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一文，原连载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和2013年第1期。该文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的成因做了概括、梳理和总结，也对拙著《红学：1954》做了补充和更正。其他5篇文章，则对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俞平伯等6位较有代表性的红学人物做了论证和评价。这些文章，曾分别刊载于《传记文学》2008年第2期、2007年第9期、2008年第10期、2007年第7期及2007年第11期。因这6篇文章均偏重于红学史方面，因将本编谓之曰“史论”。“中编”收录文章5篇，主要是考证辩驳性质，因名之曰“考辩”。此类文章，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文史功底和思辨能力。只可惜笔者才疏学浅，仅属皮毛类文章而已。“下编”收录4篇文章，均为综述或述评类文章，因名之曰“述评”。其中《新丰润说论争述评》一文，曾被时任《红楼梦学刊》主编的冯其庸先生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修改多遍。虽言辞略嫌激烈，但为了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此次亦未做大的改动，望读者见谅。此类文章，许多大学者或大师级人物不屑为之，但笔者却对之特别重视。它不仅需要高度的归纳、总结、概括能力，而且还需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类文章，实际上就是一部相关学术问题的小型学术史。

文集分为三编，无论从篇数还是字数来看，都是不对称的。但这样的分类，实在是由文章的内容所决定的，不因文害意，更不能削足适履，还请各位同道和读者见谅。

孙玉明

2013年8月12日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编 史论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 / 1

文学评论派的开山祖师

——王国维 / 56

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

——蔡元培 / 68

鲁迅的红学成果 / 86

新红学考证派的奠基人

——胡适 / 97

误入“红尘”的俞平伯 / 124

第二编 考辩

再谈《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 / 145

脂批琐谈 / 162

以“索隐”手法弹奏的“自传说”老调

——评刘心武先生的《红楼梦》“揭秘” / 173

大观园漫谈 / 191

对《红楼梦》新校本第三版的几点商榷意见 / 208

第三编 述评

曹雪芹生卒年研究述要 / 233

脂本评者研究综述 / 245

新丰润说论争述评 / 265

香山“曹雪芹故居”真假之争 / 275

第一编 史论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1954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难得一遇的一个真正的和平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自然需要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因此，自建国前后开始，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运动也随即连续不断地开展了起来。继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之后，1954年秋天，毛泽东又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炮火，但它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和震撼，却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争。

这场政治运动，虽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所触发，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必然性。下面，我们将根据现存的有关史料，简要缕述一下引发这场运动的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

一、引发运动的第一偶然性因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爆发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因素和必然性因素，即使是对俞平伯的批判，也是如此。对于在什么时

间什么地点因何种原因而触动了李希凡和蓝翎要写文章与俞平伯商榷一事，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并不太一致。蓝翎在《龙卷风》^①中说：“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希凡从家中先到我那里……在闲谈时，我说到了俞平伯先生那篇文章。他说，他也看过，不同意其中的论点。他说，合写一篇文章如何？我说，可以。他说，你有时间，先起草初稿；我学习紧张，等你写出来，我趁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空闲修改补充。我说，好吧，明天我就把书刊全部借出来，开始动手。”对此，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②中则予以反驳。而在此之前的《毛泽东与〈红楼梦〉》^③一文中，李希凡则回忆说：“记得是1954年春假中的一天，我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的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们就商量要对他的那些观点写一篇文章进行商榷和批驳。这样，我们就利用春假的时间写出了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俞先生《红楼梦》研究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也比较扼要地阐述了我们《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

相比而言，李希凡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但也存在着一点小小的失误。笔者查阅1954年的《光明日报》，发现俞平伯这一年只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题目是《曹雪芹的卒年》，发表日期是3月1日。而该年的《新建设》3月号，却出版于3月5日。因此，在3月1日这天，李希凡和蓝翎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后，又“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那么，李希凡与蓝翎萌生撰写商榷文章的日子又是哪一天呢？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1954年3月15日。这一天，《光明日报》刊载了两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一是王佩璋撰写的《新版〈红楼梦〉

①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关于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李希凡：《毛泽东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

校评》，主要针对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本《红楼梦》提出批评意见；另一篇就是作家出版社为此而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公开信，题目是《作家出版社来信》。为了证实这一推断，1999年5月8日，笔者在作家活动中心采访李希凡，他也恍然回想起来，对笔者的考辨连称“是是是”。同年9月18日，笔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此采访李希凡、蓝翎的同窗好友——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他也不加思考地一口说出：“李希凡和蓝翎是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王佩璋的文章，才决定写文章与俞平伯商榷的。大批判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希凡曾给我写信，就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王佩璋的文章和作家出版社的“致歉信”后从而萌生了撰写商榷文章的想法。当时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非常奇特：《光明日报》提供版面，而编辑发稿却由中国作家协会《文学遗产》编辑部负责。当时，王佩璋将稿子直接投寄给《文学遗产》编辑部，因此事牵涉到一家知名出版社的名誉问题，又不能确定王佩璋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所以《文学遗产》编辑部便采取了很谨慎也很负责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此事。

令人感佩的是，作家出版社很谦虚也很负责。从《作家出版社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收到《文学遗产》编辑部转来的文章后，首先对这篇文章“加以仔细研究，并重新审查《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同志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因此，“他们除已经在编辑部内进行检讨外，并已着手去改正这些错误”。“对于王佩璋同志”，出版社不仅表示“无限地感激”，而且已经和她“直接取得联系，已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并请她协助”出版社的工作。

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于1953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当时李希凡和蓝翎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居然敢于大胆地给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提出批评意见，这种精神，自然会激发李希凡、蓝翎向名人挑战的激情。当然，《文学遗产》编辑部对于王佩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作家出版社对待此事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则更会令李希凡、蓝翎感到鼓舞。

受到鼓舞的李希凡和蓝翎，由此想到了前不久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刊载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因二人都不同意俞平伯的看法，于是便产生了合写一篇文章与俞平伯进行商榷的想法。

王佩璋是一个“小人物”，可以撰文批评著名的作家出版社，并且得到了《光明日报》和《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支持，作家出版社也因此而对王佩璋表示“无限地感激”，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正自己的错误。李希凡和蓝翎也是“小人物”，为什么就不能撰文批评俞平伯呢？对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倘若当时李希凡、蓝翎没有看到王佩璋的文章及作家出版社写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信，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是否就可以避免呢？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即使李希凡、蓝翎不写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其他人也照样会写，因为不仅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许多观点已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作为“胡适派”的重要一员，他早晚都会受到胡适的连累。早在1951年1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刚刚出版不到两个多月，白盾便撰写了《〈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一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只因此文遭到《文艺报》退稿，俞平伯才暂时躲过了一劫。当然，若无后来的其他种种原因，或许这场批判运动的规模就不会那么大。

实际上，不仅李希凡、蓝翎、白盾，乃至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等新一代年轻人不同意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即使像胡乔木等来自解放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看一看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在撰写和发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曲折，便可明白这一点。

1953年秋，《人民中国》杂志社向正在“走红”的俞平伯约稿，要他写一篇从总体上对外国人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因为这是一家对外宣传的刊物，所以其所发文章并不要什么高深的研究论文，而是一篇入门或简介性的东西即可。俞平伯由于太忙也因为这类概论性的文章不太好写，过了好长时间方才写成了《红楼梦简论》。出于对外发表的考虑，为谨慎起见，俞平伯特意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请他提提意见。胡乔木很认真也很负责，看后提了许多意见，并把文章退还给俞平伯要他重写。

然而，俞平伯不仅没有按照胡乔木的观点改写《红楼梦简论》，反而将一些